

典妻习俗与中国现代文学书写^{*}

□ 章 敏

摘 要:典妻,是我国历史上最野蛮的婚俗之一。自元代始,在国家法律层面就受到越来越严厉的禁止。但事实上,这一风俗却是屡禁不绝,即使到了民国时期,典妻的风俗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依然存在。中国现代文学对之进行了丰富而深刻的书写,既表现出与相同题材古代文学书写的不同品格,又生动地呈现出民国时期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女性在一个“新法未昌,旧俗难移”的时代里婚姻权利的缺失和生存处境的艰难。这对于当代社会女性生存状态的观照也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典妻 习俗 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 I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675(2014)01—199—04

一、历史上的“典妻”与其中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发生

典妻,又称典婚,也就是民间俗语所说的“借妻生子”,指丈夫将妻子作为私人所有的物品以一定的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典当、质押、租借给别人。这是我国历史上最野蛮的婚俗之一,也是民间为生计所迫无奈之下的选择。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典婚最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出现:“建元初,狡勇游魂,军用殷广,浙江五郡,丁税一千,乃有质卖妻儿,以充此限,道路穷愁,不可闻见。”^[1]到唐代中期,典卖妻女的现象渐渐已经演化成风俗。这在柳宗元和韩愈等出任刺史期间对当地风俗的记载中都有呈现:“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债负”,“逐相典贴,渐以成风”^[2]。宋代以后,典婚这种现象亦更加普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苏轼的《再论租欠六书札子》、洪迈的《夷坚志》等典籍中都有有关典卖妻女的记载和描述。到了元代以后,典妻之风在南方各省盛行,浙江尤盛,以至于当时到浙江任职的官员王朝不得不向朝廷奏请严行禁止这一陋俗。他在写给中书省的请牒中,对典妻陋俗引发的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其妻既入典雇之家,公然得为夫妇或婢妾,往往又有所出,三年五年限满之日,虽曰归还本主,或典主贪爱妇之色,再舍钱财。或妇人贪慕主之丰

足,弃嫌夫主,久则相恋,其势不得不然也。轻则添财再典,甚则偕以逃亡,或有情不能相舍,因而杀伤人命者有之”。^[3]

由此观之,典妻的风俗在当时确实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并且从根本上说它也与中国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相悖,因此,从元代开始,国家法律就开始对之予以明令禁止:明清之际,统治者对典婚恶俗在法律上的规定和处罚更加具体和严厉,但仍不能对之予以根绝。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大总统颁行的现行律中,也有“禁止典雇妻女”的条文。可以说,典妻的风俗从元代开始就越来越受到法律的严厉禁止。但是事实上,从现在可以看到的典籍看,这一风俗却是屡禁不绝,明·冯梦龙的《寿宁待志》、归有光的《遗王都御史书》、清·赵翼《檐曝杂记·甘省陋俗》、清人徐珂的《清稗类钞》等文献中都有对此的记载。民国时期,根据1930年浙江省在全省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民事习惯调查(后汇编成《浙江民商事习惯调查会报告》),当时的宁波、绍兴、金华、温州等地都有典妻习俗存在,在福建福安、古田等地也都盛行。不仅如此,典妻的陋俗还从南方一直蔓延到北方各省,如辽宁当地所谓的“搭伙”和甘肃的“就妻”其实也都是类似于“典妻”的地方习俗。

可见女性的权利及地位在国家法律规定的层面和社会实际生活层面有着较大差距,国家法律虽然严禁将女性作为商品典卖他人,但是典妻习俗却仍然屡禁不止,这有着多方

^{*} 作者简介:章 敏,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助理研究员,博士,湖南长沙,410003。

面的社会原因。一方面典妻多发生在灾害频发或战乱频仍的时期和经济落后的地区,为贫困所迫的家庭无力维生,只好靠典卖妻女来获得经济来源。另一方面,是受传统宗法社会下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典妻的雇主大多是在无子的情况下租买人妻生子以传香火。但是,归根结底,典婚陋俗的存在还是因为中国女性地位低下所致。几千年的传统宗法社会里,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权,更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她们长期处于依附男性的地位,因而女性就像是男性的私有财产,可以当作商品一样被随意典卖。而且在这种习俗相沿多年的地区,人们并不认为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所以民不告,官亦不究。即便有民知道律例对此有所规定,但是因为种种现实原因,也会知情不报甚至互相隐瞒,官府对于这种“家务事”通常采取比较暧昧的态度,并不会真正严查,这是法律与风俗及社会现实生活的冲突,也使得女性法律权利和地位得不到真正的保障和落实。而实际在这种陋俗下,被典的女性和原夫仍然保留夫妻关系,但却不得不离开自己的丈夫和子女,走入另一个家庭与别的男性同居生活,等到生子以后,“留子不留娘”的规定又使得身为母亲的她们不得不离开同样是自己亲生骨肉的孩子回到原来的家庭当中,可以说这种陋俗给女性肉体和精神带来巨大的双重伤害,但这种伤害却也因女性地位的低下而被无情地漠视了。“女人非人”的确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绝大部分女性命运的写照。

关于典妻的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发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到伴随着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女性权利地位低下的状态渐渐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思考。明末和清代都曾出现一大批同情女性的思想家。他们著书立说甚至身体力行来表示对女性权利地位状态的不平和批判。在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曾经兴起过几次女权运动。那些妇女运动的先驱们兴办女学、戒除缠足、创办妇女报刊、争取女性参政权等等,无论是在理论宣传上还是社会实践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和进展。这些社会思潮的动向都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妇女问题成为反封建的重要主题之一。“五四”初期的报纸期刊大多具有强烈的精英启蒙意识,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强调对民众的启蒙,唤醒“人”的意识的觉醒。这种意识也很鲜明地反映到妇女解放问题上,如《新青年》就率先于1917年2月1日第2卷第6号开辟《女子问题》专栏,“五四”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晨报》也在1919年5月4日开辟“妇女问题”专栏,紧接着《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少年中国》、《星期日》等也开设妇女问题专栏,还有《解放与改造》、《新潮》等刊物上也都刊登了大量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越来越多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以报刊为阵地来进行思想传播和自我言说,对女性命运和地位进行关注和思考成为他们思想表达的重要部分;三是在前述整个社会思

潮的推动下,伴随着现代作家们对女性题材和乡土题材文学创作的热衷,典妻这一陋俗的存在自然而然地走入了现代作家们的创作视野。有着不同成长环境和生活阅历以及不同写作立场的作家们分别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和视角来讲述这一历史,他们共同构成了关于典妻的中国现代文学书写,也让我们得以从文学这架潜望镜后窥见历史真实的一个侧影。

二、关于“典妻”的中国现代文学书写

现代文学作品中,以典妻为题材的作品可谓不少,较为人知的有许杰的《赌徒吉顺》,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罗淑的《生人妻》,此外还有沈从文的《丈夫》、台静农的《蚯蚓们》、含沙的《租妻》、潘漠华的《冷泉岩》等作品也都涉及到典妻问题或类似于典妻的习俗。虽然作家们都把目光投向了这一领域,但实际上他们进行创作的时间,创作时的立场以及作品的思想内蕴都各不相同,思考该问题的角度和表达的话语形态也各异,但是正是这些不同的作品带领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入那个特定年代的特定“场景”,也引发我们对这一陋俗所造成社会问题尤其是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多角度思考。

(一)“为人生”的社会揭露与批判

许杰的《赌徒吉顺》(1925年)是最早描写典妻的现代小说,是作者针对家乡浙江典妻陋俗盛行的现象而作。全篇并没有像后来几部描写典妻的小说一样重点刻画这一习俗下女性的行为和心里,而是通篇围绕丈夫吉顺典妻前后的心理活动而展开叙述:既有赌赢了时的自傲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也有赌输了时回到家面对妻儿时的忏悔以及最后将妻子典卖出去后深深地内疚与自责。作品虽然也有着对吉顺贪念纸醉金迷生活之心态的批判,但更多的却是对他被扭曲了的心灵和人生的同情。此外,小说对典妻中间人文辅的刻画非常深刻,他从一开始就极尽口舌之能撺掇吉顺典妻,到最后又是他到富绅陈哲生家去努力说合,可以说吉顺整个典妻的过程都是在他的“催促”下完成的,而文辅和哲生这两类人物都是旧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习俗下的产物,文辅也就是在典婚陋俗中所称的“中人”或“介绍人”。如果说作者的笔触对吉顺还带着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的话,那么对文辅和哲生这两类人物则是彻底的否定和批判。小说中的吉顺妻是中国传统乡村女性的典型代表,她柔顺、隐忍,虽然作品对她进行直接描写的文字并不多,但是作为女性的卑下地位和悲惨遭遇都已经在吉顺的内疚和忏悔中以及文辅与哲生、吉顺的讨价还价中被鲜明地呈现了出来。《赌徒吉顺》的这种创作视角与作者本身是文学研究会成员的身份紧密相关。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和个人发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应该“为人生”,反映社会现象,揭露和探讨社会问题,他们创作的文学也被称为“为人生”的文学,也正因此在新文学运

动中有了一系列“问题小说”的出现,许杰的《赌徒吉顺》即属此列。在小说结尾,面对典妻的结局,吉顺的内心对妻升腾起一股因内疚自责而起的少有的温存,“他俩的心弦合奏了,他们的中间,虽然是隔着一条破棉被,但是他们觉得是胸贴着胸的,他们两颗颤跳的心房,相互的体贴着,简直比两颗红宝石,放在柔软的法兰绒上还要安适。他忘掉了一切的苦痛,一切的烦恼,一切的被人所凌辱、讪笑、卑弃的愤恨。”^[4]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小说虽然也对吉顺本身性格含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味,但更多的则是对封建陋俗和整个黑暗社会的控诉。

(二)启蒙视角与阶级意识的合奏

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5]创作于1930年,所写的也是他的家乡浙东地区的典妻风俗。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一个农村妇女从被典前到被典三年中及被典后不同时期却同样悲惨的生活。她的丈夫“黄胖”原本是一个勤劳能干的人物,但是境况却总是不佳,债就慢慢多起来了。他也因此变成了一个抽烟、喝酒、赌钱样样俱全的“非常凶狠而暴躁的男子”。他曾亲手溺杀了自己的女儿,在贫穷的逼迫下又典卖了自己的妻子。作为女性,面对丈夫的出典毫无办法。在地主家她受尽同是女性的地主婆的虐待和嘲讽。秀才地主为了要一个儿子对她还算是不坏,但等到儿子“秋宝”出世,三年典期届满,她也仍然逃脱不了被驱逐的命运。尽管这时她已经像当初舍不得春宝一样舍不得秋宝了,她甚至幻想着能把春宝接过来,永远在这新家住下去,但是这永远只能是一个梦,最后她甚至连做秋宝母亲的资格也被剥夺,只被允许叫“婶婶”。她再一次承受了骨肉分离的巨大痛苦回到已阔别了三年的家中,而此时,她那还和三年前一样瘦弱的儿子“春宝”却已认不出她来,等待她的仍然是无穷无尽的黑暗生活和对秋宝的无尽思念。小说深刻地写出了“典妻”这一野蛮陋俗对女性身心的摧残——它没有给这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带来更多经济上的改善,但却将女性推入一个身心俱裂的更加苦痛的深渊。在对女性主体心理活动及感受的描写方面,《为奴隶的母亲》毫无疑问比《赌徒吉顺》更进了一步,对“典妻”这一陋俗和几千年男权文化的批判也更加深刻。柔石曾参加过新文学运动,受过新文化的洗礼。1928年后受鲁迅影响开始译介一些国外的进步文学作品,再加上他本身是共产党员,所以从《为奴隶的母亲》这部小说可以看出,作品中既有着作者对女性在男权社会里悲惨命运万分同情的启蒙主义视角的贯注,同时又带有一定阶级意识的色彩。在作品中,女性既是受男性压迫欺凌并被当作商品随意典卖的对象,同时又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压迫的最惨痛的承受者。

(三)女性主体意识的突显与阶级对抗的同构

女作家罗淑作于1936年的《生人妻》是另一部描写典妻陋俗的现代小说,与前两部小说不同的是,这个典妻的“故

事”发生在四川沱江上游的山区,因此也呈现出与前两部描写江浙地区典妻风俗不同的地域特色。而且不同于《赌徒吉顺》中吉顺对妻子的冷漠和《为奴隶的母亲》中黄胖对春宝娘的暴戾,《生人妻》中的丈夫和妻子有着恩爱的感情。虽然丈夫有时候也对妻子发火,但他将妻子出典的动机却是中间人九叔公所说的“放她一条生路”,而不想两个人“眼对眼的看着饿死”。这相比于《赌徒吉顺》中吉顺因为欠下赌债而在文辅的撺掇下将妻子典卖和《为奴隶的母亲》中黄胖将妻子典卖是因为听了沈家婆“儿子总舍不得,妻子穷了还养在家里做什么?”的劝说,《生人妻》中的丈夫将妻出典就显得多了几分无奈和酸楚。在将妻子典出后,丈夫还赎回了妻子用了二十几年因为贫穷才抵押出去的银发簪送给她带走。妻子最终也是因为体谅丈夫才平息了愤怒,答应了被典,但临走前还不忘提醒他记得收晾在树上的衣服。夫妻情深通过这些小细节就很好地点染了出来。妻子被典卖的对象是一个“谁提起都要吐口唾沫的瘦鬼”胡大,丈夫虽感到不舍和屈辱,但也只能向命运无奈地低下了头。女人进入胡大家,受尽屈辱,在忍无可忍之下,她连夜逃出,等到天亮时赶回家一路喊着“当家的”时,破败的屋里却已空无一人,原来丈夫因为她的逃跑,被胡大兄弟告之以撞骗的罪名而被保甲抓走了。这篇小说之最不同于其他两篇作品的地方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夫妻感情状态以外,就是被典主人公的人物性格。在《赌徒吉顺》中吉顺妻正面描写的文字本来就很少,但从她对待吉顺和他们艰难生活的态度就可知道她是一个极度隐忍、柔顺的女性,对于被丈夫打骂以及被典,她都未发出自己的声音;《为奴隶的母亲》中春宝娘虽然面对被典“几乎昏去”,“连脏腑都颤抖”,还吞吐着问“决定了么?”以及到最后离开时也表示情愿饿死也不愿离开,但她最终还是顺从地去了秀才地主家,没有发出更多反抗的声音,在地主家面对地主老婆的刁难和欺侮时,她也未作出任何反抗的行为。而《生人妻》中的女人则是完全不同的农村女性形象,她从一开始就有抗争的意识,当知道丈夫将自己典卖以后,她对丈夫便破口大骂,最终她同意离开,也不是因为顺从和屈服,而是出于对丈夫的体恤。在胡大家受到欺凌和羞辱时,她努力反抗并最终逃走了。虽然结局并不好,但她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反抗意识却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方面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这与作者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有关,巴蜀女子就有这种泼辣蛮强的性格,而江浙女子则多柔顺温婉。但笔者认为,这更和作家的女性身份及其与左翼文学靠近的文学立场有关。罗淑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曾留学法国,受到过西方文化中“平等、自由”精神的浸染,所以她笔下塑造的这位“生人妻”就比其他男性作家笔下的“典妻”更多了一份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对女性不平等地位的反抗精神。此外,她的文学创作是在左翼文艺运动影响下起步并逐渐成长起来的,且她的作品创作

于阶级斗争比较激烈的30年代中后期,这就使得她的这篇作品有着更鲜明的阶级对立的色彩,小说中的胡大是“本乡本土人,自田自地人家”,相比于没有自己的土地,靠卖草为生的漂泊的夫妻俩,自然仍属于“有产阶级”。夫妻之间感情恩爱情节的设置甚至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男女对抗”的意味,而转为对“阶级对抗”的着重与强调。

(四)城乡文明冲突的一幅小影

沈从文的《丈夫》描写的也是湘西地区类似于典妻的一种风俗。“事情非常简单,一个不亟亟于生养孩子的妇人,到了城市,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在那方面就过了好日子,名分不失,利益存在。所以许多年青的丈夫,在娶媳妇以后,把她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也竟是极其平常的事情。”^[6]沈从文淡然的笔墨写出了那地方上人精神的麻木,他们把这叫“生意”,并且认为这种工作和别的工作同样,既不和道德冲突,也不违反健康。虽然有的女性做了“生意”就慢慢与乡村离远,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但“仍然不缺少在任何情形下还依旧好好的保留着那乡村纯朴气质的妇人”,《丈夫》中描写的就是这么一位。丈夫去看妻子的时候,媳妇会往他嘴里塞上乡下人抽不上的“哈德门”香烟和他最喜欢吃的冰糖,于是他也“尽她在前舱陪客,自己也仍然和平的睡觉了”^[7]。然而在探望媳妇期间亲历了两次媳妇在前舱接客,自己在后舱落泪的情形后,男子的内心起了变化,当媳妇把挣来的钱都交到他手中时,“男子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水保来船上请远客吃酒时,只有大娘同五多在船上,问到时,才明白两夫妇一早都回转乡下去了。”^[8]可以说,沈从文的观照角度和立场与其他作家都是不同的,在这里,没有过多的对女性地位卑下状态的揭示,也没有对阶级对立立场的展现,更没有对女性主体意识的突显,更多的则是对城乡文化冲突和乡下人纯朴人性的描画和肯定。而女性充当男性玩物和泄欲工具的本质却都被淡化了,而这只能说是作为女性的另一种悲哀。

此外,描写典妻的还有台静农的《蚯蚓们》和潘漠华的《冷泉岩》,前者写的是农民李小因为“年岁欠收,无钱使用”,遂将妻子和儿子卖与他人,小说也并未对李小妻在被卖这件事情上所表现出的态度和立场进行描写,女人对于自己和儿子同时被卖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不满与反抗,像那个年代中国的大部分乡村女性一样,对于这样的谬运她们只能默默地承受。小说中出现的另一个女性——李小的表舅母,就是她一再劝李小“心放宽些,年头变好,弄点钱还可娶一个”。同为女性,她对于女性被卖的命运却是麻木的。潘漠华的《冷泉岩》亦是描写了一个女性在各种生活境遇下被当作商品多

次辗转卖与他人的悲惨遭际,面对这样的境遇,女性周遭的人及女性自己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而正是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出女性地位卑下的积习深重以及民国时期乡土社会女性命运的悲惨。

三、结语

其实对典妻之俗进行表现的文学作品从元、明时期就有。但那些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内蕴和现代文学作品有着很大不同。如关汉卿的杂剧《刘夫人庆赏五侯宴》中就有典卖女性的情节,在此剧中王屠夫的妻子王嫂在王屠夫死后,因自己无力殡葬丈夫、抚养儿子,但是又想保持“贞节”,有道是“一马不背两鞍,双轮岂碾四辙?烈女不嫁二夫”,于是她就将自己在一定时间内出典给了赵太公,得了些财物将丈夫埋殓了,然后带着儿子去了赵太公家。至于后来被赵太公私下将典身契换作了卖身契则是后话。在这里没有对这一陋俗的批判,正和“卖身丧父”颂扬的是女子的孝一样,这里的“典己葬夫”也有着一种女性自我牺牲的“崇高意味”。又如明朝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铁念三激怒诛淫妇》中所写的“我那营中,常有出汛的,出征的,竟有把妻子典与人用。或半年,或一载,或几月,凭你几时”^[9],在这里同样也没有对典妻对女性造成戕害的描写,相反似乎透出一种对人性的“体恤”。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对“典妻”习俗进行的丰富而深刻的书写拥有着完全不同于古代文学作品的内在品格,生动地呈现出民国时期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女性在一个“新法未昌,旧俗难移”的时代里婚姻权利的缺失和生存处境的艰难。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典妻陋俗及“典妻文学”都将成为历史,但其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状况和女性生存状态的“立此存照”,仍有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这对于当代社会女性的生存状态的观照也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注释:

[1]《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83页。

[2]韩愈:《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全唐文·卷五百四十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66页。

[3]《中华文化通志·婚姻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4]许杰:《吉顺》,选自《许杰短篇小说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页。

[5]柔石:《为奴隶的母亲》,《柔石经典》,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

[6][7][8]沈从文:《丈夫》,《沈从文别集·丈夫集》,岳麓书社1992版,第59、62、86页。

[9][明]西湖渔隐人:《欢喜冤家》,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责任编辑:禹兰